论规约符及其连续性

——皮尔斯符号理论中的重要概念^①

彭佳 李跃平 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在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中，规约符是最为复杂的符号，其最为普遍的代表是语言符号。然而，在语言符号之上建立的文化符号，以及在语言符号之下的自然符号，都可以被视为规约符，因为规约符的建立基础，即习惯，是一个连续发展、跨越了自然和语言文化的概念。规约符的这种连续性，是符号连续论思想的重要体现，对当代符号学研究影响深远。

关键词：规约符；皮尔斯；习惯；连续论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6)02-0034-07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2.005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 (C. S. Peirce) 提出的符号三分法，是当代符号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根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他将符号分为像似符 (icon)、指示符 (index) 和规约符 (symbol)，这一分类深刻地影响了当今符号学家，在认知符号学、符号现象学和生物符号学等领域得到了深入的讨论。规约符作为典型的不依靠理据性而依靠法则建立的符号，其最为常见的代表就是语言。本文试从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尤其是自然符号的角度出发，讨论规约符的特殊属性及其形成的基础，从而探讨皮尔斯的符号连续论思想在他对规约符的论述中的反映。

1 作为规约符的语言符号及其特性

对于规约符，皮尔斯的定义是：“规约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借助法则——常常是一种一般观念的联想——去指涉它的对象，而这种法则使得这个规约符被解释为它可以去指涉那个对象。” (CP2.47)^②既然法则是约定俗成的、规约的，理据性就不是规约符建立的标准。语言作为任意武断的符号，它依靠的是系

统法则进行意义指涉和表达，是典型的规约符。皮尔斯在讨论规约符的时候，所举的最多的，就是语言符号的例子。

语言作为规约符，它所具有的第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的法则性，即，它与对象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依靠系统建立的规约关系。皮尔斯明确指出，所有的词语、句子，即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是规约符。他举例说，“人” (man) 这个词仅仅是三个音素的连续出现，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由于某种习得的法则 (acquired laws)，它可以被理解为某个人或者一些人。这种法则是一般性的规则 (general rules)，任何一个以“man”的形式出现的英语单词就必然遵循这个意义规则，因此，规约符是可重复的，它的时态是未来时：它预先规定了每一个将来以“man”的形式出现的词语的意义。(CP2.292)

为了说明规约符这种由规约性的、共同认可的法则起作用的特点，皮尔斯回到“symbol”一词的词源上进行了探究。他指出，在古希腊语中，“σῦμβάλλειν”一词的意思是“扔到一起”，可以用它来表示约定的形成过程；而“symbol” (σῦμβάλλον) 这个词，

作者简介：彭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符号学，E-mail:pj8024@163.com。李跃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育。

就是指靠约定而形成意义的符号：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名词是“symbol”，是规约性的符号（conventional signs）。（CP2. 297）由于规约符依靠的是整个符号系统法则，也就是说，它只在某个系统内起作用，离开了这个系统，它就不再有意义。也就是说，它的意义传播是以符号系统为边界的，越过符号系统，这个符号就不再成立。比如“man”这个词，在汉语符号系统中虽然可以找到与其意义对应的词语，但汉语符号系统内并没有形式完全相同的词汇存在。

规约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自主性。由于规约符是依靠共同约定的法则建立的，它的意义生成就不完全依靠于解释者，而是具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如诺特（Winfred N $\ddot{u}$ th）所说，“当然，规约符是由人创造的，就像孩子是由他们的父母创造的。然而，就像孩子那样，一旦规约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开始拥有自己的生命。”（N $\ddot{u}$ th, 2014:175）规约符的这种独立性，表现在它往往是对一个社群或群体在使用它时起引导作用，如语言词汇的意义对该语言的使用者而言是相对固定的，某个文化系统中的宗教民俗象征等也具有较为稳定的编码和解码系统，从而驱使符号的使用者做出相应的意义解释。语言符号作为规约符，它的自主性尤其明显：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Tartu-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甚至将自然语称为“首度模塑系统”（Primary Modeling System），认为语言符号系统在对对象进行指称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义世界的生成，从而形塑着不同文化对世界的认知建构。（Lotman, 1990）语言符号作为规约符，“规定”着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分节和认知，其自主性不言而喻。

尽管规约符的意义是约定的、法则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产生变化：它的意义会因为使用的语境不同而产生各种演变，这也是为什么说规约符的“自主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而非完全性的。文化性的规约符，如象征、隐喻等，其意义的嬗变自不待言；哪怕是语言这种相对而言变化较少的规约符，意义也会因为语境发展而改变。这就是规约符的第三个特征：它的“繁殖性”。例如，象征作为最典型的规约符之一，它的意义就会不断繁殖。赵毅衡（2012:203-209）指出，象征的生成方

法有三种，分别是文化原型、社群复用和个体创造；其中，社群的复用对于象征的意义累积和繁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人们常使用的表情符中，“击掌”的图片本意指的是美国文化中的“high five”，表示祝贺对方成功，或是问候的意思。但在中国文化社群的使用中，却被视为“双手合十”的佛教符号，用来表示为对方祷告、祈福之义，这个象征符号的意义得到了增加。语言作为规约符，尽管变化相对较小，但原理同样如此：语言符号的意义不仅可以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增加和变异，它甚至可以实现“再理据化”：也就是重新建立语言和理据性之间的关系。（丁尔苏，2012）如网络文字“囧”“焚”等，都是由于符号的使用者根据其符形重建了其对象之间的像似关系，从而赋予了其不同的意义。

在词语的这种意义繁殖能力之外，诺特还指出了语言这一规约符的另一种生长能力，即语言词汇量的不断增生：“词语不仅个别地生长，语言的整个词汇在数目上也会增加。这是因为语言具有原自系统的潜力，这是它们和生物有机体所共有的特性：规约符具有自我生产能力，这在新的规约符的生产中能够得到证明。”（N $\ddot{u}$ th, 2014:178）的确如此，语言在和其他语言的交流中，在日常生活的使用及文艺创作中，都能不断地产生新的词语，就好像作为原自系统的生命体的细胞能够持续地自我复制一般。而且，更为有趣的是，语言这一规约符还会不断地消亡，这和生命体在新陈代谢中细胞会不断衰老和死亡的过程是非常一致的。作为细胞个体的词汇的消失和再生，使得语言系统整体在动态平衡中生长和发展，这和多细胞生物的生存发展形态非常相似。规约符与生命体的这种相似性究竟源于何处？继诺特之后，费尔南德斯（Elieso Fernandez）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2012年，他在《皮尔斯的习惯与规约符之生命》（“Peircean Habits and the Life of Symbols”）一文中明确地指出，由于规约符的基础及“习惯”，包括了生物的习惯，规约符可以被视为生命体生产的符号，如哺乳动物发出的示警声即是如此。（Fernandez, 2012: 205）两年后，他进而讨论了习惯与宇宙层级性的关系（Fernandez, 2014）。习惯作为规约符的基础，它的连续性的确是规约符之连续性的根

本之所在。

2 规约符的建立基础：习惯

在讨论规约符问题时，皮尔斯列举最多的是语言规约符号，语言依靠后天建立的语法系统规则来指涉它的对象。然而，诺特指出，规约符的基础并不一定是语言或文化法则，也可以是天生的或后天规约的习惯 (habit) (N $\square$ th, 2010)。皮尔斯 (2014: 60) 认为，“规约符是由这样一种符号构成，这种符号之所以为符号，仅仅是（或主要是）因为它被这样使用或被这样理解，而不管我们的习惯是天生的还是规约的，也不用考虑决定原初选择这些符号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规约符得以形成的基础，可以是天生的习惯，那么，规约符的主体就可以不仅仅是人，而可以拓展到其他生物；而除了语言符号和建立在语言符号基础上的文化符号之外，非语言符号、或者说自然符号，也可以划入规约符的范畴 (李斯卡, 2014)。

事实上，不少生物符号学家认为，在有初步社交法则系统的动物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较为初级的规约符，这种较低层次的规约符是符号“连续论”的重要表现之一。比如，蜜蜂群的成员之间就经常使用规约符来进行表意沟通。(Kroeber, 1952) 蜜蜂的觅食的“8”字舞旨在用不同的角度和频率向社群的其他成员指出蜜源的方向，因此具有很强的指示性，可以被理解为指示符。然而，尽管此符号的作用在于“指出”，却需要解释群体内部的成员通过对动作次数和角度的判定，按照群体内部约定俗成的法则进行解读，才能得到意义结果，做出反应。这种法则是出自于蜜蜂天生的“习惯”，它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法则性的。为了区分清楚，不妨如此说，单个的觅食舞符号可以被视作指示符，即单符 (sinsign)；而此符号类型本身则是型符 (legisign)，因为它是法则、是约定，其作用对象是整个解释群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和生物界的其他指示符不同，不是被符号主体所感受到的提示危险、食物和伴侣方向的类别符号；而是为了表意而被创造出来的、面向整个群体的符号，它的法则是可以重复的、未来时态的，而可重复性和未来时态则是规约符的典型特征；因此，可以将

其视为规约符。

不少符号学家对这一看法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规约符的基本特征是它的规约性 (conventionality)：既然是规约、约定，那么，它就一定是语言和文化行为，由此可以推断，规约符是只有人类才能够使用的符号。霍拉乌卡 (Teresa Hoł $\acute{o}$ wka) (1981:79) 认为，“规约性首先是非自然的，其次是非理据的，再者是非普遍的。”这里说的“非自然”，也就是说规约符必定是由人类使用的：这和卡西尔的看法相当一致——卡西尔将人称作“规约符的动物” (symbolic animals)，意在将规约符作为人与其他生物的分野。(Cassirer, 1962) 由是，规约符作为一个绝对的门槛，使人与其他生物、文化与自然得以泾渭分明。

然而，如前文所说，这种截然分割和对立的二元方法论，一直以来是皮尔斯所反对的范式。(阿赫提·维科·皮塔里宁，代玮炜、赵星植, 2014) 秉持“连续论”立场的皮尔斯对符号类型和过程的基本划分是三分式的：就符号类型而言，从像似符、指示符到规约符，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这种连续论的模式，也体现在他对“习惯”的讨论之中。

早在1888年，也就是皮尔斯提出“连续论”一词的4年之前，他就已经用连续发展的观点来讨论宇宙的产生：“关于时间存在之前的最初阶段的发展，我们的观点必定是像《创世记》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模糊和具有比喻性。我们必须得说，在不确定性的子宫中由第一性的原则产生了某物，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道闪光。然后，由第二性的习惯产生了第二道闪光。尽管时间还不存在，但第二道闪光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在第一道闪光之后的，因为它源自于第一道闪光。接着就会有关联越来越紧密的其他连续体，习惯和增强习惯的趋势，直到所有的事件都关联并汇聚到类似连续流的某物中。” (CP1.412) 在1891年的笔记中，他又写道，“物的状态在无限的过去中是混乱、混沌，它的非物性 (nothingness) 在于完全缺乏规律性。物的状态在无限的未来中是死亡，它的非物性在于法则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缺乏自然性。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的物的状态处于一些和法则相对的、绝对的自然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总是因为习惯的增长而

在增加的法则的服从之间。形成习惯的趋势和一般化的趋势是自我增长的，通过发展习惯的习惯，它自身得以增长。”（CP8.317）

照皮尔斯的看法，习惯是在混沌蒙昧之中产生的规律性，因为这种规律性，宇宙才变得清晰分明，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在这一阶段的习惯，纯粹是一种重复性的现象法则，它是物理性质的，可以将其视为类似于物理或化学规律之物。也就是说，所谓习惯，就是“重复之前运动”的趋势，是一种规律性，使宇宙成为了一个连续的、清楚的世界，而不再是之前那模糊一团的混沌和星云。这就是最初的、最低层面的习惯：物理和化学规律——就如费尔南德斯所指出的那样，“从这个视角而言，物理的基本法则被视为不匹配的一般性和范围之间最初建立起来的习惯。”（Fernandez, 2014:82）

皮尔斯认为宇宙是进化的、发展的，它从混乱和无序朝着规律性演进；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习惯和习惯之间的调节使宇宙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宇宙在达到完全的规律性之后，会进入另一种“非物”的状态：当所有的一切都规则化之后，就没有了几率、没有了可能性，从而没有了发展的动力和空间。在宇宙的混乱和死亡的两极之间，存在着相当广袤的、递进性的演变过程，习惯从简单到复杂，在各个层面之间次第推进发展。

（Fernandez, 2014）习惯与习惯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有些习惯是永久性的，有些则会消失，而能够永恒存在的只有物质。那些作为物理和化学规律而存在的习惯，应当就是皮尔斯所认为的永久性的习惯；而会消失的习惯，则是生物体所拥有的习惯：不管这种习惯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是其他生物所拥有的还是人类专属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当然，在这种可能会消失的习惯中，生物的自然习惯处于是较低层面上的。皮尔斯写道，“在空间部分的习惯和身体的习惯中产生了冲突，在两者能够协调之间冲突不会停止。”（CP1.416）所谓“空间部分的习惯”，就是物理空间、自然环境中的规律性，而“身体的习惯”，指的是生物的生存繁衍规律：当该物种的生存繁衍规律不能适应物理环境、自然环境的规律性时，冲突就会产生，要么生物个体死亡或物种灭绝，它的生理习惯随之消失；要么生物适应了环

境，习惯发生了改变，从而获得了两者之间的协调。皮尔斯将习惯称为“所有生命体所从属的法则”，（CP3.360）在这个意义的最低层面上，指的就是生物天生的生存繁衍规律。

由于皮尔斯并非生物学家，他并没有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生存习惯进行分类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习惯可以是遗传的，也可以是习得的。在他1880年对神经和刺激之间的关系讨论中，皮尔斯写道，“因此，当重复对神经的一种刺激时，在之前的类似情况下发生的所有行为都更有可能会发生，并且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之前的类似情况下经常发生的行为……如此，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回应既定刺激的牢固习惯很快就能被建立起来。这样获得的习惯可能通过遗传进行传播。”

（CP3,157-158）在这里，皮尔斯举的例子是神经反应之于某种刺激的习惯，也就是至少是动物和人才会有这种习惯。然而，考虑到皮尔斯曾指出习惯是所有生命体的规律，而非动物和人才有的规律性，而且他已经把更为基本的物理化学规律纳入到习惯的范畴之内；此外，植物的生化反应（如皮尔斯曾提到的向日葵的向光运动）和动物的神经反应有类似之处，遗传性的习惯也应当把植物的生长规律包括在内。

习惯从物理规律进化到生物习性，再上一层，就是人类的语言规律及其建立在语言上的文化习俗，即规约性。皮尔斯如是说：“习惯并不是意识的情感，而是行为的一般法则，人在某种特殊的情形中或多或少会以某种一般的方式行事。因为它会产生一个信念或观点；而一个自然的信念或观点，是人行为的根据，因此在普遍意义上它是一种习惯。”（CP2.148）在这里，皮尔斯直接将“人”作为习惯的主体，因为只有人的思维才能产生信念（belief）或观点（opinion），而这种指导行为的一般法则是既定的、约定俗成的。

对于习惯进化的这种层次递进性，皮尔斯自己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把人类大脑的习惯称之为“最高级的习惯”（CP3.160），认为它就是一种信念（belief）。有趣的是，这种“最高级的习惯”本身也是连续发展的：它的再现体或者说具化可以被称之为“判断”（judgment）；而在信念到判断的具化过程，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楚的发展过程，可以被称之

为“思想”(thought)。判断一旦形成,信念就会启动新一轮思想过程,即对下一个判断的实现,如此不断演进,趋于无限。在这里,信念其实和柏拉图的理念(idea)颇为类似,而这一论述已经相当接近于形而上学的范畴:由此可见,从最低层面的物理化学规律,到生物习性,到语言文化的规约性,甚至先验式的信念及其具化表现,习惯始终贯穿了宇宙发展的各个层面,是皮尔斯连续论思想的显著表现。

作为规约符的建立基础,习惯是连续发展之物,因此,建立在其上的规约符也是连续的、渐进的发展。规约符并非仅仅指语言符号及其上的文化符号,它也可以包括其他较为高级的群居动物所使用的、规则性的表意符号。规约符的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它既包含了非语言符号、自然符号,也包含了语言符号、文化符号,是一个宽广的带状范畴。

3 从非语言符号到语言符号:规约符的连续性

规约符(symbol)作为皮尔斯符号类型三分法中最为复杂的符号,它“仅仅或是主要基于这一事实:它就是如此被习惯理解和使用的,不论习惯是自然还是规约性的,并且和最初的选择动机无关。”(CP2.307)习惯,在这里指的是生命体使用和理解符号的规则,它是规约符形成的基础:由于习惯也可以是自然的,照此推断,规约符不一定是人类所独有的符号,而是其他生命体的自然习惯也可以发展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它一定是生命进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才出现的符号类型:乌克斯库尔所说的生命体的“感知符号”和“行为符号”中,大部分是像似符和指示符。(Uexkull, 1982)其他生命体所使用的符号要成为规约符,必须符合一个基本条件:要有群体所认可的法则性和非理据性。皮尔斯说规约符与“最初的选择动机无关”,就是说规约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具有理据性,而是由系统规则所决定的。群体的(自然和规约)法则,是规约符的基本属性。

尽管规约符是皮尔斯的符号分类中最为高级的符号,但皮尔斯并没有明确说过规约性是属于文化还是自然的范畴。他只提到,“每一个规约性的符号(conventional sign)

都是型符(反之则不然)。”(CP2.246)然而,根据他的论述可以推断出,规约性应当是语言文化性的,因为他在谈论规约符和习惯时,常常将“自然的”和“规约性”的习惯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规约符的基本特质。早在1894年,当他谈及规约符时就说道,“规约符一词的意义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再给它加上新的意义都会是对语言的损害。我不认为我加诸于这个词的表意,即认为它是规约性的符号(conventional sign),或者说认为它取决于(获得的或天生的)习惯,是什么新的意义,这是返回到它原有的意义。”

(CP2.297)一年之后,皮尔斯明确说,“我曾把规约符仅视为规约性的符号,这是另一个错误。”(CP2.340)故此可以看出,皮尔斯所认为的规约符有两种,一种是“规约性的符号”(conventional signs),以语言符号为其代表;另一种则是自然的符号,即本文所提到的动物群体所使用的规则符号。(N 8th, 2010)

与像似符和指示符不同的是,规约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表意而被创造出来的,是为了被使用存在的,它必然有符号的创造者和接收者(哪怕这两者可以重合),并且,它是按照一定的法则所创造,在很多情况下是被一定的群体所接受的——哪怕它仅仅是生物信号也是如此;而像似符和指示符,在其最基本的生物信号层面,不一定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符号的接收者感受和解读出意义的(比如,人汗液中的酸作为被虱子感知的像似符,以及表示觅食方向性的指示符)。蜜蜂的觅食舞蹈是规约符,它具有创造者,即觅食的蜜蜂;它具有基本的法则,即用角度和振动频率来表示食源的距离和方向;它是为了表意而产生的,目的在于告诉其他蜜蜂食物所在地;它具有群体性,在蜂群内部有效。皮尔斯说,“规约符是因为使用规约符的心灵而和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心灵的话,这些联系就无法存在。”

(CP2.299)所有符号都必须都心灵相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只有规约符必须是和“使用规约符”的心灵有关的,也就是说规约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被使用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的创造者就是为了用它来表达意义才将其生产出来。

心灵,或者说准心灵,作为规约符的制

造者，其初衷是为了表意；而这种法则性的意义之所以能够被领会，依靠的是规约，或者说习惯。习惯可以分为自然的和文化的：所谓自然的习惯，就是生物天生或习得的社群表意方式；而文化习惯，就是语言和文化所约定俗成的法则，即规约性。这种自然和文化的习惯，是判定一个符号是否是规约符的基础。

在《皮尔斯之规约符定义中的习惯标准》（“The Criterion of Habit in Peirce’s Definition of the Symbols”）一文中，诺特指出，皮尔斯之所以曾经视规约性为规约符的标准，是为了“让那些熟悉传统的规约性符号之概念的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定义”（Nøth, 2010:83）。因为规约符（symbol）一词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被广泛运用，因此，诺特争辩说，皮尔斯曾沿用规约性符号的概念，是他不得向强大的传统所做的一次妥协；而真正决定一个符号是不是规约符的，是从自然到语言文化性的习惯。他指出，在皮尔斯对规约符的一段著名论述中所提到的“习得的法则”（acquired law）、“一般规则”（general rule）和“规律性”（regularities）等概念，其实就是指的“习惯”。（Nøth, 2010:85）

皮尔斯这段著名的论述如下：“规约符是这样一种再现体，它的再现品格仅仅作为一种规则而存在，而这种规则决定了该规约符的解释项。当我们念出或写出‘man’这个词时，它仅仅是这个被说出或写出的词的一个副本或体现……它之所以是符号，仅仅是因为一种习惯或者说习得的法则使它的副本被解释为一个人或一些人这一事实。这个词和它的意义均为一般规则……规约符是无限未来的法则或规律性。”（CP2.292）

皮尔斯所举的例子显然是一个语言规约符，他在解释这个例子时说，是习惯或者说习得的法则使这个符号的副本能够被人正确地解读。也就是说，在这里，皮尔斯认为习惯和“习得的法则”一样，可以是语言的、文化的法则，也就是规约性。这和皮尔斯所持的，习惯是自然的和习得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除了规约性这一人类语言和文化的习惯之外，还存在着较低层面的习惯：也就是其他生命体的习惯。最低层面的习惯是天生的、遗传的，如本文一再举例说明的蜜蜂的8字舞，是由蜜蜂先天的意义图示就已经决

定了的习性所生产出的规约符。在这一规约符的传达过程中，接收者（其他蜜蜂）的解释项是由蜂群之间的先天法则所决定的。大部分生物群体之间使用的规约符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说，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就没有根据后天习得的习惯法则来生产规约符的能力：马戏团的兽群表演，其基础就是驯兽者和兽群之间由后天规约建立起来的习得法则，在这种习惯基础上生产出来的符号，可以被视为较低层次上的规约符。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生产出来的规约符有很大程度的指示成分。比如，对由于条件反射作用而能够根据驯兽者的呼唤声高低而进行协作表演的动物们而言，这种呼唤声实际上指向的是食物；然而，动物同时又能根据声频的高低快慢所建立的法则做出反应、进行合作，这就赋予了呼唤声以规约符的性质。正如皮尔斯所说，“指示符和像似符均有可能是规约符的组成部分”（CP2.294），呼唤声这一符号虽然指向的是食物，但它的建立法则却是动物们后天获得的习惯，因此是典型的规约符。由此可见，从其他动物天生的习惯到后天获得的习惯，再到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习惯，规约符得以建立的法则是具有连续性的发展过程，而规约符本身也是具有连续性的一个概念范畴。

既然习惯是从自然过渡到文化的，那么，将习惯作为规约符的判断标准，就有利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规约符不仅仅是人类所独有的，而是在符号发展过程中从自然到语言、文化的一个连续带。规约符不仅包含了语言符号、文化符号，它还可以往下延伸，覆盖其他生物群体所使用的系统规则符号的范畴（Kull, 2014）。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助于加深对皮尔斯连续论立场的认识，有助于打破文化和自然的割裂和对立状态：而这正是当今符号学的重要诉求。规约符的连续性所体现出的符号学范式，使得对它的理论重访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规约符作为皮尔斯符号学的重要概念，其最为普遍的范例是语言符号。然而，在语言符号之上建立的文化符号，以及语言符号之下的生物符号，都可能属于规约符的范畴。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带状概念，规约符的建立基础，即习惯，也是一个包含了从自然到语言文

化的连续概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打破文化与自然的二分，建立整体的、通观的符号学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和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外国语言文学”（2015XWD-S0502）阶段性成果。
- ② CP2.47表示哈佛八卷本《皮尔斯文献》第2卷，第47段。本文遵照皮尔斯研究引用规则采取此缩写形式。

参考文献

- [1] Cassirer, Ernst.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 Fernandez, Eliseo. Peircean Habits, Broken Symmetries, and Biosemiotics[A]. In Romanini, Vinicius & Fernandez, Eliseo (eds). *Peirce and Biosemiotics: A Guess at the Riddle of Life*[C]. Dordrecht, Heidelberg, New York, London: Springer, 2014.
- [3] Fernandez, Eliseo. Peircean habit and the life of symbols[J].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2(2):203-215.
- [4] Kroeber, A.L. Sign & symbol in bee communication [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52(38): 753-757.
- [5] Kull, Kalevi. Physical laws are not habits, while rules of life are [A]. In Thellefsen, Torkild & Sørensen, Bent (eds).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n His Own Words: 100 Years of Semiotics,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C].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4.
- [6] Hołówka, Teresa. On conventionality of signs[J]. *Semiotica*, 1981(1-2):79-86.
- [7] Lotman, Juri.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M].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Nöth, Winfred. The life of symbols and other legisigns: More than a mere Metaphor?[A]. In Romanini, Vinicius & Fernandez, Eliseo (eds). *Peirce and Biosemiotics: A Guess at the Riddle of Life*[C]. Dordrecht, Heidelberg, New York, London: Springer, 2014.
- [9] Nöth, Winfred. The criterion of habit in Peirce's definition of the symbol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2010(1):82-93.
- [10]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 [11] Uexküll, Thure von. Introduction: Meaning and science in Jakob von Uexküll's concept of biology[J]. *Semiotica* 1982(1): 1-24.
- [12] 阿赫提-维科·皮塔里宁，代玮炜，赵星植. 延伸皮尔斯：维科·皮塔里宁教授访谈[J]. 符号与传媒，2014（9）：48-67.
- [13] 丁尔苏.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并行不悖 [J]. 符号与传媒，2012（4）：118-131.
- [14] 皮尔斯著，赵星植译. 皮尔斯：论符号[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 [15] 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 反思皮尔斯的符号学：纪念皮尔斯逝世100周年[J]. 符号与传媒，2014（9）：13-31.
- [16] 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Symbol and Its Continuity: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Piercean Semiotics

Abstract: In C. S. Pierce's classification of signs, symbols are the most advanced and developed signs, with the foundations laid on habit, a concept crossing the borders of nature and culture. Symbols, therefore, include nature signs, languages, and cultural signs and turn out to be an embodiment of semiotic synechism,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model for contemporary semiotics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 studies.

Key Words: symbol; C. S. Pierce; habit; synechism